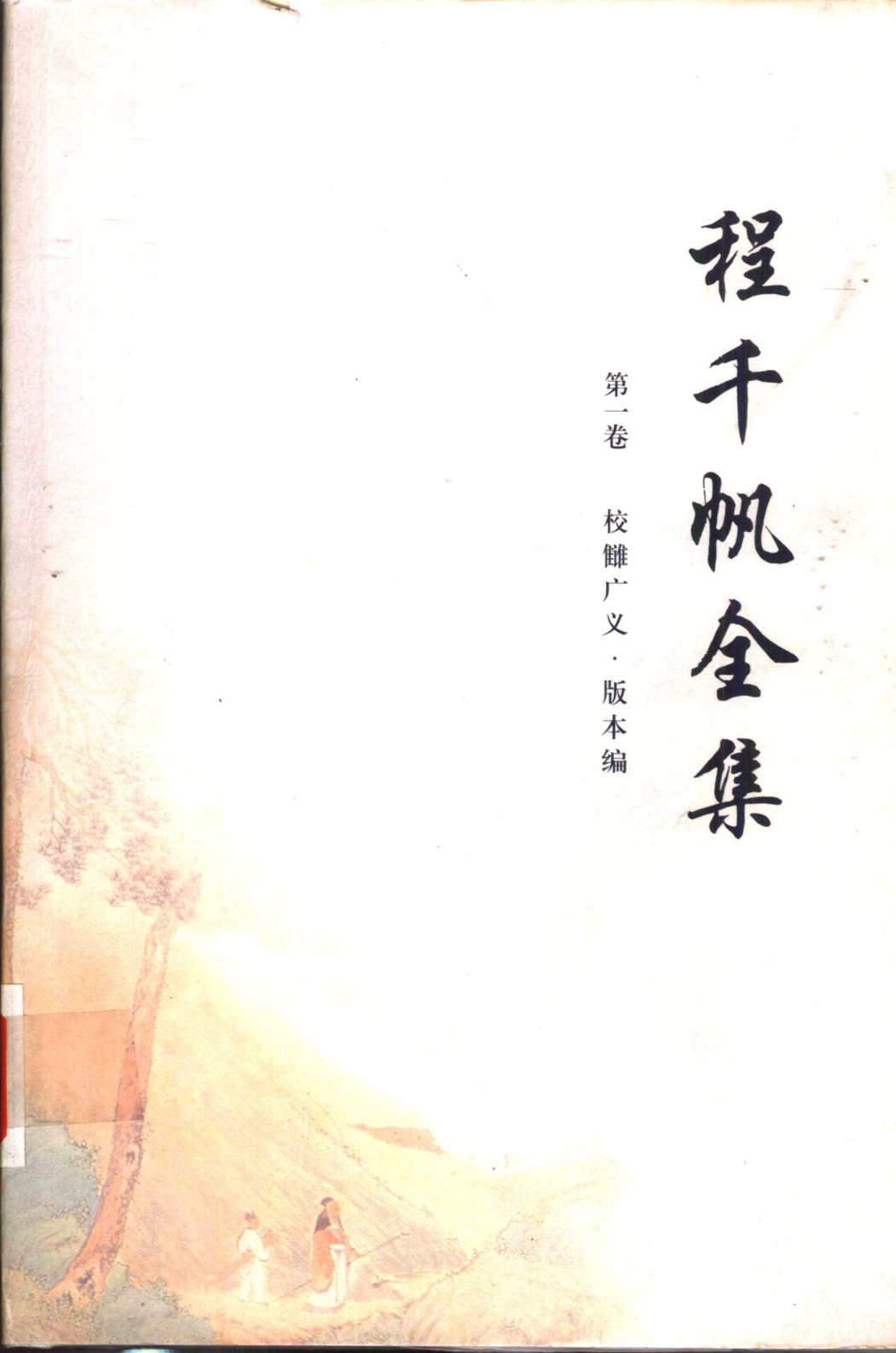


# 程千帆全集

第一卷

校讎广义·版本编



# 程千帆全集

第一卷

校讎广义·版本编

程千帆 徐有富 撰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程千帆全集/程千帆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8

ISBN 7-5434-3979-4

I. 程... II. 程...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文集②程千帆-文集 IV. I 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540 号

**程千帆全集**

全十五卷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84.75 印张 4.27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370.00 元

ISBN 7-5434-3979-4/I · 535

# 总 目 录

- 第一卷 校雠广义·版本编
- 第二卷 校雠广义·校勘编
- 第三卷 校雠广义·目录编
- 第四卷 校雠广义·典藏编
- 第五卷 史通笺记
- 第六卷 文论十笺
- 第七卷 闲堂文藪
- 第八卷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
- 第九卷 被开拓的诗世界 杜诗镜铨批钞
- 第十卷 古诗今选(上)
- 第十一卷 古诗今选(下) 读宋诗随笔
- 第十二卷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 第十三卷 两宋文学史
- 第十四卷 闲堂诗文合抄
- 第十五卷 桑榆忆往

## 总 序

去年年底，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动表示，愿意出版程千帆先生的全集。不久，社长王亚民先生就亲自到程先生家登门拜访，商议全集的编辑出版事宜。河北教育出版社不计经济效益，但求嘉惠学林；程千帆先生则希望把平生著述作一全面的总结，双方的意愿相得益彰，于是就产生了这部五百多万字的《程千帆全集》。由于程先生年事已高，精力欠佳，又适逢病目不大能看细字，故命我编定全书，出版社且让我写一篇总序。我立雪程门已一十九年，当然很乐意有此机会以服弟子之劳，于是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核对材料、订正文字等工作。至于作序，则自惭鲁钝，未能传先生之芬芳。为人作序本易得佛头著粪之讥，况且程先生的学术墙高数仞，我怎有能力说清其中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呢？思之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先把全集中各类著作的写作经过及主要内容作些介绍，再简单地谈谈自己的体会，但愿对读者稍有裨益。

第一类是校雠学著作，即《校雠广义》一书，共有“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校雠学本是一切学术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可惜这件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到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亲自讲授校雠学课程，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由研究生记录、整理成《校雠学

略说》，以油印稿的形式在几所大学流传。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位——徐有富学长毕业之后，程先生就与他合作，把《校雠学略说》扩充，改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历十多个寒暑而完成全书。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出现。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读者不仅能从本书中了解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文史研究的实际指导，后者也许是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

第二类是历史学著作，即《史通笺记》一种。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分秒必争地通读了晋、隋八史，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如鱼得水。然而厚积薄发，程先生的史学著作则仅有《史通笺记》一种。《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很受史学界重视。可是此书虽经卢文弨、浦起龙等学者之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下苦功钻研《史通》，并曾在大学开设《史通》课程。他广搜善本，博采各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笺记”的形式对前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此书实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幾）之功臣”。

第三类是文学批评史著作，即《文论十笺》一种。程先生对古代文论有深入的研究，此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选出十篇文章，先作详赡的笺注，然后结以案语。从表面上看，此书仅是一部简要的文论读本，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溢出于此。本书所选的文章计有陆机一篇、刘知幾两篇、章学诚五篇、章炳麟一篇、刘师培一篇，选目独具手眼，其编排不按时代而依内容，也具有现代意识。十篇文章分别副以“论文学之界义”、“论文学与时代”等标题，事实上

构成了具体而微的理论体系。文末的案语也多有精到的见解，颇能帮助读者领会文章的现代意义。正因如此，此书很受读者欢迎，自1942年以《文学发凡》的书名刊布以来，已经屡经修订，多次重版。

第四类是古典文学论著，即《闲堂文藪》、《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都是论文集。程先生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闲堂文藪》中的论文即涉及散文、辞赋、词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然而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则是古典诗歌的研究。也许可以说，关于古典诗歌的论文标志着程先生学术造诣的最高峰。《古诗考索》共收论文三十余篇，所涉内容上起汉末古诗，下迄今人所作旧体诗，而以唐诗为主。所论题旨小至一字一句意义的辨析，如《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大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这些论文中最受学界称道的是从研究具体作品入手而终于导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也即人们通常称之为“小中见大”的那些，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显然，它们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在于为学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被开拓的诗世界》则是一部关于杜诗的论文集，其中部分论文是程先生指导学生写成的。程先生对杜甫深为敬仰，对杜诗研究下过很深的功夫，并曾在好几所大学里开设过杜诗课程。他晚年在南京大学重开此课，除了讲授杜诗学知识外，更着重启发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实即程先生的杜诗研究与杜诗教学的双重成果的结晶。有关杜诗的研究论著早已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是始终把杜诗置于古典诗歌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为杜诗学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和宏阔的视野。

第五类是文学史著作，即《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和《两宋文学史》两种。前一种是程先生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合著的，故书名冠以“程氏”二字。中国古代的史家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

最高目标，所以最能体现中国史学精神的史学著作应是贯通古今且具有鲜明史观的通史。程先生治学文史兼擅，他的文学史研究也贯彻了上述史学精神。他以为研究文学史不应局限于某一段时期，只有贯通古今才能准确把握整个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并深入理解其精神。所以本书的论述重点不再是某些作家作品，而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诸如文学观念的传承演变，各种文体的兴盛衰落，文学技巧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演变过程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与以往的文学史著作相比，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不再满足于提供文学史的许多断片或轨迹点，而是力图描绘出一条完整的线索来。以五十多万字的篇幅涵盖从上古迄现代的全部中国文学史，本书可说是开创之作。

如果说《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以简明精要见长，那么《两宋文学史》则以详赡细致为优点。本书是程先生与吴新雷教授合著的，两位作者都对宋代文学史下过很深的功夫，但相对而言，程先生对宋代的诗词古文理解得更深一些，而吴教授则对小说戏曲研究得更多一些，所以他们的合作达到了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效果。《两宋文学史》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论述了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内容，如宋代四六等；二是对于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有更细致深辟的阐述，如吴文英词。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它非常注重揭示史的线索，在突出大作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对形成文学潮流的中小作家群予以充分的关注。此外，它非常注意一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在清晰地勾画各种文体内部的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对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进行了论述，如宋四六对小说戏曲的影响等。虽说最后一点由于缺乏学术积累的前资而展现得不够充分，但这毕竟体现出力求创新的探索精神，格外引人注目。

第六类是文学史专题研究，即《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种。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在学术研究中深受陈氏的影响，本书就是借鉴陈氏倡导的诗史互证之法所取得的硕果。



早在1936年，程先生把陈寅恪的著名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由英文译成中文，从此对陈文中涉及的“行卷”这种历史现象进行了长期的钻研，终于写成这本专题论著。本书对行卷这种伴随着唐代科举考试的现象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对行卷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样，文学史界长期聚讼纷纭而不得确解的一个问题，即唐代科举对文学到底有何影响，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本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论点新警，切切实实地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第七类是古代诗歌的选注评析，即《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两种。《古诗今选》属稿始于1956年，是程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作进行的，后因沈先生不幸去世，乃由程先生独立完成。此书的内容包括八代诗、唐诗和宋诗三个部分，涵盖了五七言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几个时期。选本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程先生对此深有会心，所以此书从选目、注释到讲解、评析，都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选家的诗学观点。唐、宋诗的选本早已出现过许多种，《古诗今选》的选目当然会有沿袭以往选本的地方，但是仍有许多作品是程先生独具慧眼而发现的，比如唐卢纶《腊日观咸宁郡王部曲姜勒擒虎歌》、宋王令《梦蝗》等诗，都是长期被选家忽略的好诗。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诗人的入选篇数与其他选本有较大差异，如唐诗中选刘禹锡诗十首，超过盛唐的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诸人；又如宋诗中选黄庭坚诗十五首，仅次于苏轼、王安石而与陆游持平。这些地方分明与传统的看法有较大出入，其原因之一便是程先生对整个诗歌史有独特的观照，他的评选标准体现了向诗歌审美本质的复归。如果说《古诗今选》尚因照顾普及读本的需要而较多地认同学界共识的话，那么《读宋诗随笔》便更鲜明地呈现出程先生的学术个性。此书原名《宋诗精选》，因其中部分选目与《古诗今选》重复，此次编入全集时删去注释而仅保留解说，故改称今名。由于此书以“随笔”的形式来评析作品，行文有

较大的自由度，所以修短合度，笔随兴至，既有点到为止的三言两语，也有淋漓酣畅的大段议论。书中有许多关于宋诗的真知灼见，又出之以平易晓畅的文字，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另有《杜诗镜铨批钞》一种，是以传统方式对杜诗所作的批语，因所论皆为杜诗，篇幅又较短，故附见于《被开拓的诗世界》之后，但其性质则接近本类著作。

第八类是诗文作品，即《闲堂诗文合抄》和《新诗少作》两种。程先生出生于诗人之家，自幼即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也始终不废吟事。可惜他中年因非罪获谴，旧稿毁于秦火，所以平生诗作只残存二百余首。程先生晚年所作序跋类文字，大多用文言写成，短小精悍，文采斐然，已臻老成之境，具有美文性质，所以与诗合为一编。程先生一向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把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结合起来，不可偏废。而感性思维除了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感受之外，也包括亲自从事一些创作活动。学者必须体会创作之甘苦，才能具备更细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程先生在古典诗歌研究中获得高度的成就，与他自身创作的造诣是分不开的。程先生虽然以研究古代文学而知名，但他决不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问窗外事的学究。他对现实非常关心，对当代文学也十分注意。他在青年时代曾热心于新诗创作，与好友孙望先生等组织了“土星笔会”，并创办新诗刊物《诗帆》。虽说他后来因专注于古代文学研究而不大写新诗了，但留存下来的新诗作品却是现代诗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记录。现经整理删选，把这些作品编成《新诗少作》。

第九类是回忆录，即《桑榆忆往》一种。程先生的一生经历曲折，数次遭遇沧桑世变，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年轻时及见许多学术宗师，如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都是他亲承音旨的老师。又如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庞石帚等，都是他有所请益的学者。他的夫人沈

祖棻教授是当代杰出的女词人，患难夫妻，文章知己，学术上多收切磋之益。凡此种种，都成追忆。这部回忆录不仅是程先生个人生平事迹的记录，而且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一代学人的嘉言懿行和歌哭悲欢，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从以上的粗略介绍可以看出，程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全集，就是他一生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六十年心血的结晶。那么，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呢？我以为是的，那就是沈祖棻先生在《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所揭橥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考证与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绝少往来。甚者至于互相轻视，唯我独尊。精于考证的学者常常觉得专搞批评的人流于空疏，而长于批评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专攻考证的人陷于烦琐。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大概是当代第一人。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有四个层次。一是文献学的研究，即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校勘、辑佚、整理，力求提供确实可靠的文本。二是历史学的研究，即对千头万绪的文学史实进行考订、甄别、梳理，力求掌握文学史长河中每个环节的真实面目及其来龙去脉。三是美学的研究，即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自身价值进行解读、阐释、评析，力求最充分地实现现代人对古代作品的审美接受。四是哲学的研究，即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古代文学进行宏观的把握，力求揭示其根本规律及其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普遍意义。从程先生的著述及日常言论来看，他所说“考证”包含着前两项内容，而“批评”则包含着后两项内容。由此可见，程先生所倡导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古代文学

作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学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个层次的研究是完全合理的。程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他对同辈乃至后辈学人专攻某一层次的研究而得到的成就都深表赞许。但是，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必须要有一部分学者兼通考证与批评，而专攻其一的学者也不能与另一类研究隔膜、疏离，这才能够融会贯通，真正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部文集正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

程先生重视文献整理，他亲自主编《全清词》和《中华大典·文学典》，而且下大功夫钻研校勘学。他重视史实考订，为了弄清唐代行卷之风的真相，曾在史料中钩沉索隐达数十年。他具有卓异的审美能力，在艺术体会和风格辨析方面尤见功力。他也善于从纷繁杂乱的现象中抽象出理论来，曾对古典诗歌的一些普遍规律有所揭示。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并不把考证和批评视为各自独立、畛域分明的两类工作，而把它们看作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他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专题论著固然是兼有考证与批评的综合研究，他的许多单篇论文也同样是融考证与批评于一体的范文，例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与八个醉的》等文，都是从对史实的精密考证和对作品的细致分析入手，双管齐下，然后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程先生在古代诗歌的研究中所以能触手生春，独得圣解，除了天性颖悟和思力强劲等因素，正确的方法论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以下事实：这部全集的总字数不是很多，而且有好几种著作是程先生与他人合作的，这是特殊的时代所造成的结果。1957年，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正当盛年的程先生因为正直而获罪，从此被剥夺了近二十年的工作时间。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程先生重返课堂和书斋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了。妄加的罪名可以平反，被贬的待遇可以恢复，但是被耽误的时间却是无法挽回的。从四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二十年光阴，这正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阶段啊！尽管程先生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尽管他的才思依然十分敏锐，但要想把计划中的学术课题全部亲手完成，毕竟是力不从心了。况且重执教鞭的程先生视教学为第一要务，为培养后辈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是程先生的好几种著作采取了与人合作的方式，合作者中有他的同事，更多的则是他亲自指导的学生。应该说，这些合作实际上也是程先生培养后辈的一种方式，合作者通过实际操作而获得了方法的训练，也通过讨论质疑而锻炼提高了思辨能力，所以它们具有薪尽火传的特殊意义。然而毋庸讳言，如果程先生没有丧失二十年时间，如果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没有中断，那么他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独力完成这些著作，并使它们的学术水准更上一层楼，他也一定能够写出更加卓越的其他著作来。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于是这部全集只能以目前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后代的读者看到这部全集时，千万不要忘记它是一位生活在 20 世纪历经坎坷的学者的学术记录，是一部忧患之书。

1998 年 4 月中旬

受业莫砺锋谨序

## 校讎廣義叙錄

校讎廣義一	版本編
校讎廣義二	校勘編
校讎廣義三	目錄編
校讎廣義四	典藏編

叙曰：

治書之學，舊號校讎。比及今世，多稱目錄。核其名實，歧義滋多。《文選》卷六《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云：“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為讎”二字據胡克家《考異》補）蓋校讎本義，惟在是正文字。然觀《國語·魯語》載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則次第篇章，亦稱校矣。此一歧也。而鄭樵《通志序》謂其《校讎略》之作，乃“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詳所論列，求書、校書之外，兼及類書、藏書。是此諸業，亦歸校讎。此又一歧也。逮章學誠撰《校讎通義》，自叙其書，以為“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其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

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則雖求之、校之、類之、藏之，猶未足以盡校讎之能事。必也，明系統，精類例，使人得由書籍之部居類別，以見道術之源流異同。此又一歧也。

校讎歧義，具如上述。還語目錄，何莫不然。《〈文選〉註》嘗引《別錄·列子目錄》，其文今存，蓋即劉向校書，隨竟奏上，合《漢書·藝文志》所指“條其篇目”之目與“撮其指意”之錄而成之篇。是目錄之始，在為一書條篇目，撮指意，俾覽者得於籀讀之先，知其大較，其事甚明也。嗣班固《漢書·叙傳》述其志藝文，有“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之語。持是以稽《漢志》體例，則班氏之所謂目錄，已引申條一書篇目之義為定羣書部類；撮一書指意之義為別學術源流。後來承響，遂有以為治學涉徑之學者。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即是此義。此一歧也。而黃丕烈《汪刻〈郡齋讀書志〉序》曰：“余從事於此，逾二十年。自謂目錄之學，稍窺一二，然閱歷既久，知識愈難。曾有《所見古書錄》之輯，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見之究未遍也。”考丕烈昔人列之賞鑒家，其精詣獨在版本，旁及校藏；於類例出入，學術派別，初未聞有所甄明。茲亦以目錄為言，則賞鑒校藏諸端，皆此學所有事矣。此又一歧也。然語及目錄學界義之恢宏，近人張爾田之言，尤為極致。其序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曰：“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而為此學也，亦非殫見洽聞，疏通知遠之儒不為功。乃世之號目錄家者，一再傳後，寢失其方，百宋千元，標新炫異。其善者為之，亦不過如吾所謂總總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為綱紀，固未之有聞。”詳張氏此所謂目錄，即前引章氏之所謂校讎，蓋籠括一切治書之學，而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為之主。此又一歧也。

由上可知，蓋始有校讎目錄之事，繼有校讎目錄之名，終有校讎目錄之學。其始也相別，其繼也相亂，其終也相蒙。若夫目錄之名，

昉諸漢也，目錄稱學，則盛有清。雖徵之載籍，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嘗記乃祖頌“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可據以遠溯宋初，然固未甚通行也。故自鄭樵而後，治書之學，統被校讎之名，其正詁遂轉晦。逮於乾、嘉，異書間出，小學尤精，古籍脫訛，多所改定。校讎本義，復顯於時。彼以類例部次為主者，乃不得不別號其學為目錄。其在初興，章學誠嘗持異議，見意於《信摭》之篇。其言曰：“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為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叙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不解，問伊：書只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章氏云云，乃已習於固有之名，遂致譏於新興之學。然言雖駿利，殊鮮和人。則以校讎一詞，沿用最久，疊經變易，義陷模糊。不獨目錄之學，拔幟樹幟，即專事是正文字者，且或改稱校勘之學，以自殊異。夫以偏概全，既涉淆混，求其副實，更造新名，此學術史中公例，無足驚奇，而況宋代已有此稱乎？此其所論，不免拘虛之見矣。其後若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云：“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為後世校讎之祖。班《志》綴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徹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版本，一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所言雖推衍鄭、章，而已校讎目錄二名交舉。張氏《〈劉向校讎學纂微〉序》又云：“《隋書·經籍志·簿錄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



制。’知校讎者，目錄之學也。”而德謙以鄭氏校讎一略，備論編次，因亦言：“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則校讎者，乃目錄之學，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則均徑以校讎即是目錄。諸家之說，皆相亂相蒙之證，此二者之同異，與夫所以同異之故，胥治斯學所當先知者也。

至名稱而外，範疇若何，自來學人，亦有數說。“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為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弼、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收采異本，上則補金匱石室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鄒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之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之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闕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此洪亮吉《北江詩話》之說一也。“自劉、班志藝文，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自晁、陳傳書目，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海內流傳，或鈔或刻，不下百數十種，然亦分為兩派：一則宋刊明鈔，分別行款，記刻書之年月，考前賢之圖記，此賞鑒家也。一則包括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備校讎，鈔新帙以備瀏覽，此收藏家也。”此繆荃孫《〈古學匯刊〉序目》之說二也。“近世言藏書者，分目錄版本為兩種學派。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為校勘之學。”此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說三也。“網紀羣籍、簿屬甲乙者，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辨章學術、剖析源流者，則史家之目錄是也。鑒別舊槧、校讎異同者，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提要鉤元、治學涉徑者，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此汪辟疆師《目錄學研究》之說四也。嘗試考之，洪氏所言，乃就藏書者流立論，非一指治書之學。所謂掠販之輩，直書估之精於鑒別者爾，奚足名家？若考訂一項，則治